

1984—2013
《当代作家评论》
30年文选

林建法◎主编

先锋的皈依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I206.7
146



1984—2013
《当代作家评论》
30年文选

先锋的皈依

林建法◎主编



中医学 0650031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林建法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锋的皈依 / 林建法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1

(《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

ISBN 978-7-205-07725-9

I. ①先…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0301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8.25

字 数: 498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姚飞天

书 号: ISBN 978-7-205-07725-9

定 价: 58.00元

序 言

林建法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前夕，几位朋友相约在常熟举办了一场座谈会，其中有的朋友几乎是给《当代作家评论》写了三十年的稿子。在这之前，我对是否办这样的活动颇为踌躇。我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以杂志为平台研究别人，现在突然由别人来讨论我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感觉不适应。但转念之间，又觉得《当代作家评论》并非我个人的事业，换一个位置聆听朋友们的教诲，于我于杂志都大有裨益。出席座谈会的朋友有批评家、作家，再加上我这个编辑，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学与批评杂志的对话空间。如果忽略那些对于杂志和我的溢美之词，朋友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其实并不局限于《当代作家评论》，涉及到批评与创作、杂志与作品的经典化等诸多问题，这本杂志以及我本人只是近三十年文学生产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个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记。在文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当代作家评论》在辽宁创刊。其时，我在福建编辑另一本评论杂志《当代文艺探索》。两年以后，我从南方的福州到北方的沈阳，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在这个编辑部度过了我的青年、中年时期，又在退休后延聘至今。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杂志社度过的。尽管这么多年来有这样那样的艰辛和困难，但比起这本杂志的价值，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这个编辑部也曾经有这样那样的故事，而我则把自己的所有都编辑在这本杂志的字里行间。我在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杂志副主编，二〇〇一年担任主编，协助其他主编或独立主编杂志。在《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时，我想起为这本杂志作过贡献的历任主编

思基、陈言、张松魁、晓凡和陈巨昌几位先生，特别缅怀在晚年仍然关心杂志的陈言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呵护这本杂志，在我和我前辈们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办刊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

从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和文学的语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是文学不再处于中心位置，也即所谓的边缘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消失甚至死亡，恰恰相反，文学一直以自身的方式生长，优秀的作品始终是一本批评杂志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语境中，如何以新的办刊方式应对新的文化秩序，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另一个变化是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任何一家杂志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我不能说自己没有困惑和犹豫，特别是在受到一些人为的干扰时；但是，我觉得我和杂志的同仁方寸未乱。无论人事、语境等有了怎样的变化，文学、文学批评以及以此为心的批评杂志，其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的困扰，坚持文学的理想，严格批评的尺度，坚守敬畏文字的立场。这几个方面把持住了，杂志就不会随波逐流。可以说，正是在应对新的危机中，《当代作家评论》完成了历史转型，既传承了曾经的特点，但更多地呈现了新的风貌，而我个人的办刊风格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就像有许多人肯定我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另外一些人不赞成我的办刊风格，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一份杂志不可能不留下主编的个人印记，重要的是它留下了几代人观察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痕迹。

在这次座谈会上，王尧兄建议我编辑一套《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以学术的方式纪念曾经的岁月。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从二〇一二年九月，我便着手这一工作，几乎重读了三十年的《当代作家评论》。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套文选有十种：《百年中国文学纪事》，收录的论文侧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包括文学史著作的撰写等问题；《三十年三十部长篇》收录了关于三十部长篇小说的文论，以及讨论“茅盾文学奖”的文章；《小说家讲坛》以小说家在苏州大学的讲演为主，还收录了部分小说家的讲演或文论；《诗人讲坛》收录了关于诗歌研究的论文，诗歌研究是本刊近几年来重点编发的内容，试图改变目前以小说研究为中心的状况；《想象中国的方法》是关于作家、学者的谈话录，从中可以管窥作家、学者或批评家用写作想象中国的方法；《讲故事的人》是关于莫言研究的专辑，《当代作家评论》自创刊以来发表研究莫言的论文一百余篇，这本书收录了小部分相关论文；《信仰是面不倒的旗》是研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韩少功、李

锐、尤凤伟、王安忆、铁凝、范小青、阿城、刘恒、叶兆言、刘震云、王朔和史铁生的合集；《先锋的皈依》和前两卷一样，同样是收录了反映《当代作家评论》主要特征之一的作家论，涉及到的作家有阎连科、余华、格非、阿来、残雪、林白、陈染、李洱、毕飞宇、孙甘露、北村、吕新、艾伟、劳马、马原、刁斗和王小波；重视辽宁和东北作家研究也是本刊的特色和使命，《新生活从这里开始》大致反映了当代辽宁作家的研究状况；《华语文学印象》侧重收录了研究港澳台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的论文。

所谓“挂一漏万”的说辞同样适合这套书。尽管有十卷的篇幅，但相对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论文，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我以分类的方式来编选论文，难免疏漏掉一些无法归类的论文。因此，这十本书虽然大致反映了《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的面貌，但研究者不必受此限制。

在文选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江同志。张江同志对于困难中的《当代作家评论》如何办刊给予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并且给予了经费支持。张江同志爱文学、懂文学、重批评，给我和国内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要向出版文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协助我编选的李桂玲以及关心文选出版的朋友致谢。



序 言林建法 / 001

阎连科 YANLIANKE

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王 尧 / 002

——阎连科小说及相关问题平议

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陈晓明 / 023

余 华 YUHUA

清醒的说梦者莫 言 / 036

——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

悲悯的力量洪治纲 / 040

——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

苏 童 SUTONG

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张学昕 / 068

苏童的意义汪 政 晓 华 / 086

——以中国现代小说为背景

格 非 GEFEI

- 格非与当代长篇小说 张 柠 / 100
- 格非小词典或桃源变形记 敬文东 / 110
- “江南三部曲”阅读札记

阿 来 ALAI

- “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 周政保 / 146
- 《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述方式
- 山已空，尘埃何曾落定？ 何 平 / 154
- 阿来及其相关的问题

残 雪 CANXUE

- 小屋的恐惧和救赎 杨庆祥 / 174
- 《山上的小屋》中的历史讲述
- 超越女性 荒 林 / 184
- 残雪的小说

林 白 LINBAI

- 月亮的神话 丁 帆 齐 红 / 194
- 林白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原型”解读
- 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 施战军 / 199
- 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

陈 染 CHENRAN

- 致现代主义童话作家陈染 李 劫 / 206
- 忧郁的荒原：女性漂泊的心路秘史 孟繁华 / 210
- 陈染小说的一种解读

李 洱 LIER

饶舌与缄默：生活在自身之外 南 帆 / 220

被卷入日常存在 王鸿生 / 227

——李洱小说论

毕飞宇 BIFEIYU

汁液饱满的《玉米》 李子云 / 234

《平原》的虚和实 金 理 / 238

孙甘露 SUNGANLU

暴力与游戏：无主体的话语 陈晓明 / 250

——孙甘露与后现代的话语特征

“作家，在本质上是要把内心的语言翻译出来” 罗 岗 孙甘露 / 274

北 村 BEICUN

先锋性的萎缩与深度重建 谢有顺 / 282

——兼谈北村《施洗的河》

先锋的皈依 南 帆 / 291

——论北村的小说

吕 新 LVXIN

感情世界里的孤独漫游 段崇轩 / 306

——吕新小说创作综论

“民间”的诗性建构 吴义勤 / 318

——论吕新长篇新作《草青》的叙事艺术

艾 伟 AIWEI

- 轻逸诗人艾伟汪 政 / 330
- 从“寻根”到“审根”洪治纲 / 341
- 论苏童的《河岸》和艾伟的《风和日丽》

劳 马 LAOMA

- 民间节日诙谐形式的精神风格化程光炜 / 352
- 评劳马的三部话剧
- 顽皮之舞孙 郁 / 361

马 原 MAYUAN

- 马原的叙述圈套吴 亮 / 370
- 评论马原小说的两难设计郭银星 辛晓征 / 381

刁 斗 DIAODOU

- 窥视者说郜元宝 / 392
- 刁斗小说印象
- 自我·情爱·游戏·家园吴义勤 / 397
- 刁斗近期小说的一种读法

王小波 WANGXIAOBO

- “伦敦天空的发明者”阎晶明 / 412
- 我读王小波小说
- 智者戏谑戴锦华 / 420
- 阅读王小波



阎连科

YANLIANKE

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 王尧
他引来鬼火，他横扫一切 陈晓明

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 文学史的盲点出发

——阎连科小说及相关问题平议

王 尧

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阎连科无疑是大器晚成。

如果从一九七九年发表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算起，阎连科将近有三十年的写作史了。我们今天在系统论述阎连科时，没有分歧地把他的创作历程大致描述为“瑶沟系列”、“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以及“和平军人系列”；而接在后面的“耙耧系列”则似乎难以囊括他的那些中篇和长篇小说，因为以“耙耧”为背景的小说既有《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和《耙耧天歌》，也有风格似乎骤变的《坚硬如水》和《受活》。我现在觉得，那些容易概括和命名的系列，只是我们认识阎连科的一个背景和参照系，其中多数作品只是阎连科大作的草稿。我这样近乎武断的说法应当不会刺激阎连科，虽然每一个作家都爱惜自己的写作，但是真正能够打动作家自己的文字其实也是少数而不是多数，一个作家是在自己的取舍之中往前走的，与批评家的鞭策并无太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回顾阎连科的创作时，我们发现在他的文学地图上，那个叫“耙耧山脉”的地方逐渐标识出来，和许多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一样，阎连科有了自己“邮票”大的地方。发表《年月日》的一九九七年因此成为阎连科文学编年中一个重要的年份，此后十年阎连科的创作开始成为重要的话题，他给我们带来的共识、歧见，连接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秩序变化中的诸多重要环节。我想在这样的思路中，贴近阎连科，贴近与他相关的问题。

一 现实与内心的冲突

阎连科和现实语境的紧张关系，在《受活》之后的写作中暴露无遗。而在此之前的几部小说如《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也已经反映出阎连科和现实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阎连科作品的意义以及他被关注、阐释的原因与此关系密切。

我们知道，在很长时间里，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并未接纳阎连科，即使《年月日》的发表已让他声名鹊起，这与阎连科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有关；一个作家在八十年代的状况决定了此后文学史对他的评价程度，这是新时期文学论述中的一个特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文学思潮早已散淡，但文学批评还是习惯于在命名思潮中论述作家作品，比如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主义写作，私人写作成为话题等。问题是，相当多的作品是在文学思潮之外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秩序重新形成。因此，文学批评需要在变动不居的更宏大的背景中讨论具体的问题。贾平凹《废都》引起的争议以及不断的重评，王安忆《长恨歌》获得的高度评价等，若是从文学批评的方式看，我以为是借此重建了写作者、文本、阐释者与转型期社会文化的联系。特别是关于贾平凹《废都》的分歧，现在看来主要还不是文本性爱叙事的审美标准问题，而是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性问题。作家与现实的关联问题，成为批评必须面对的议题。在阐释作家与“外部”的关联中，我们关注了写作本身，勘探了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和精神支点，并且呈现出文本生产过程中现实的力量。可以说，重视作家回应现实的方式，仍然是批评的取向之一。多年来，因为形式批评的高贵，我们羞于说白这一取向的必要性。文学的文化研究，为这一取向提供了知识背景；而“纯文学”在九十年代的演变与处境，又让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一个学理问题。

阎连科这些年的写作，激活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话题，考察阎连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及个中得失是把握其写作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分析其文本的前提。

九十年代以后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及相关问题的派生，已超出我们在八十年代的预见。在八十年代，作家处理自己与现实关系的能力已经十分成熟老到甚至圆滑，这种能力又突出地表现在对“政治”的处理上，当时的“纯文学”观念为作家的取舍提供了“合法性”。我们后来比较多地注意八十年代“纯文学”的文学性，其

实在当时，也还有另外一批作家和另外一种写作，是强调文学对生活的“干预”。部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八十年代通常是以作家的发言和写作为重要形式的，往往又表现为对现实的直接“干预”。“干预生活”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事实上是指对“现实”甚至“政治”的干预，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危机之后，文学界几乎很少使用这个说法。事实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有“间接”和“直接”之分；而“直接”的方式通常被视为远离“文学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变得暧昧。在一九八五年之后，批评界曾经把当时的文学格局描述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二分天下。其实，现实主义文学在当年已经悄悄转向并且收缩，现代主义对文学的渗透、颠覆则是大面积的，迅速而来的后现代的解构也未在本质上构成对现实的批判。此一“收缩”和“扩张”，使“个人”和“形式”的问题得以彰显和强调，顺应“市场”和“大众”的方向，而对“社会”和“现实”的介入改造被弱化。文学在八十年代以后分化，“纯文学”也遭遇危机，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因为文学的抗议性、批判性这一最根本、最重要的性质在现实中缺失了。李陀在《漫说“纯文学”》中这样说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没有和九十年代急遽变化的社会找到一种更适应的关系。很多人看不到，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纯文学’这个概念原来所指向、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使得‘纯文学’观念产生意义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它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而这应当是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性质。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学很难能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以致九十年代的严肃文学（或非商业性文学）越来越不能被社会所关注，更不必说在有效地抵抗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同时，还能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①我想，作家和批评家未能调整自己的写作，既有对“纯文学”的坚持，也有对“纯文学”的茫然（即便现在

① 李陀也对文学批评表达了不满：“我觉得真正严重的是，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并没有指出这一问题，相反，批评家或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赞扬、鼓动那些迎合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写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叹‘文学边缘化’啦、‘知识分子边缘化’啦，然后更进一步论证‘边缘化’怎样必要，怎样合理。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样的态度。”见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我们也无法来界定“纯文学”),对匆匆而来并急速变化的现实的茫然。在这一日新月异的现实之中,作家和批评家未必没有意识和思想,但确实没有能够很快探索到文学与现实的关联点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审美方式。这种手足无措的行为几乎是具有普遍性的,是转型期社会的主要文化征候。所以,我愿意在对作家更多的理解之中援引李陀下面的说法:“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当然这样说有一个缺点,就是忽略了一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与社会变革同步,坚持以自己的写作对现实进行大胆干预的作家,比如八十年代就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到九十年代,有莫言的《酒国》,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①李陀在这里提到了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在阎连科《年月日》之后的作品中,《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对现实的“干预”可以说是一部比一部强;而阎连科的精神特征在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不断强化和呈现,也与其他作家相区别。这里有必要说到阎连科《受活》那篇引起争议的代后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可能由于阎连科表述的片面、急躁和情绪,而误解了阎连科的内心真实以及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他虽然有一些创作谈之类的文字,但以如此激进的、直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阎连科或许是第一次,而在小说文本之外对现实发言几乎也是第一次。当阎连科真正以自己的思想来连接他的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包括那些原先期待阎连科有思想的读者都可能对他的言论觉得突兀,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我们甚至也不太习惯于阎连科的发言方式。在我看来,这篇“代后记”与其说阎连科表述的是一种创作方法,毋宁说他以极端的姿态和论述方式确立了一种对待现实、对待自己的态度。阎连科显然意识到了现实主义本身的限制以及现实对现实主义的限制(这种被自身和现实限制的现实主义在创作中呈现肤

^① 见李陀《漫说“纯文学”》。



浅、分裂、虚假、扭曲等状态)，这样一种意识在八十年代反思激进主义文学话语时已经萌生，但阎连科在今天的语境中重新谈论这一话题自有其意义。在阎连科早期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优势和限制也是明显的，从他的那些作品中能够读出自叙传的痕迹无疑与此限制有关。在阎连科晚近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出阎连科处理写作与现实关系的转变：由想象进入现实到由现实进入想象，这是他自己在谈到《丁庄梦》等作品时的概括，“现实”在写作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相对于阎连科自己以前的沉默和文坛一段时期里的暧昧态度，阎连科的立场是反抗的、不妥协的，他的锋芒指向“主义”和“现实”。阎连科所否定的“主义”是改变了“原有方向与性质”的“现实主义”：“自鲁迅以后，自五四以后，现实主义已经在小说中被改变了它原有的方向与性质，就像我们把贞节烈女改造成了贤淑雅静的妓女一样，使她总向我们奉献着贞烈之女所没有的艳丽而甜美的微笑。仔细去想，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内心的深疼，不能不体察到那些现实主义大旗下蜂拥而至的作品，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纸张：虚伪、张狂、浮浅、庸俗、概念而且教条。时至今日，文学已经被庸俗的现实主义所窒息，被现实主义掐住了成长的喉咙。可是，尽管这样，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还在我们阅读的大街上招摇过市，晃来晃去，穿街而行，而且它们都如游行示威一样，打了横幅与旗帜，穿了由上边学者和理论家们下发的如奖杯奖状一样光亮笔挺的现实主义的西装。”^①在这里，阎连科无情地嘲讽、抨击了变质的“现实主义”及其文学。所以，他放弃的是“改变了原有方向和性质的现实主义”。我这样说，丝毫不是替阎连科缓颊，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或许才能弄清楚，阎连科为什么会认为“现实主义，不存在于生活与社会，只存在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抵制变质的现实主义的途径是回到“内心”：“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的。哪怕从内心生出的一棵人世不存在的小草，也是真实的灵芝。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是超越主义的现实。如果硬要扯上现实主义这杆大旗，那它，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阎连科毕竟不是理论家，他的论述自有不周延之处。比如，接下来的问题是：内心生活是否皆为真实？变质了的生活与社会是否会扭曲内心真实？无疑，要保持内心的真实就务必抗

^① 阎连科：《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代后记）》，《受活》，第36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拒“主义”和“现实”对内心的扭曲，只有在尊重内心真实的前提下，才能超越“主义”，才能发现遮蔽了的“现实”。内心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应当包含这样的内容。

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势必引发内心冲突，而阎连科所有的焦虑概出于此。阎连科面对现实的内心状态决定了他写作的方向，也决定了他作品的精神气质。他曾经说过，少年时他崇拜权力、都市和生命三样东西，因此也有了对这三样东西及其衍生物的恐惧。检点自己的创作，阎连科认为自己近年的创作都与恐惧相关，直接的、最早的构思与创作的原因都与恐惧相关：“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讲了一个人与死亡抗争而无奈的故事。我希望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我已经四十多岁，有过许多经历，目睹了太多的爱情的虚假，对虚假的、逢场作戏的爱情感到一种真诚，对所谓崇高的爱情感到一种敬畏和害怕。因为有一种对崇高的恐惧，就写了《坚硬如水》，讲了一个严肃的、革命的‘爱情故事’，借以排遣自己对爱情与革命的敬畏和害怕。我因为腰椎、颈椎长年有病，东跑西颠，四处求医，十几年不愈，就总害怕自己会有一天瘫在床上，成为一个残疾人，所以今年又写了一部有关人类残疾的长篇小说，叫《受活》。还有《年月日》对恐惧寂寞的描写与抵抗，《耙耧天歌》对疾病的恐惧与抵抗，如此等等。”^① 阎连科的种种恐惧因现实而来，又在写作中连接了文本与现实的通道，突破了现实和现实主义对他的限制。

这种紧张的关系以及持续不断、未见缓解的内心冲突，让阎连科的小说文本充满了张力，有时也使他的写作少了从容而多了急迫。在阎连科这十年的作品中，《丁庄梦》无疑是部最直接介入现实的作品。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丁庄梦》重新关注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日常的问题，一个艾滋病的题材，揭示了人类共有的问题，作者的大爱贯穿始终。卖血的农民固然无知愚昧，而他们生存的环境和命运又为何至于此？“流在地上的血，如开在春天里的花。”丁庄的梦，是恶之花。阎连科说：“希望我的小说充满一种刺心疼痛的感觉，充满着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土地的刺心热爱和关注。”我想，阎连科在代后记《写作的崩溃》中有一段文字，书写完稿后的感觉，可能是许多读者阅读后的状态：“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飘动的

① 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演讲集》，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